

湄潭文萃(二)

湄水弦歌

胡静 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湄潭县委员会 编

湄潭文萃（二）

湄水弦歌

胡静 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湄潭县委员会 编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湄水弦歌

编委会

顾 问：魏在平 李 颢 郑 方 陈佐明 杨启梅

主 任：张志勇

副主任：周开迅

委 员：耿品生 王刚莲 梁 峰

主 编：周开迅

副主编：王刚莲

作 者：胡 静

校 对：肖义美 熊代中

书号：湄潭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黔遵湄（2015）第 003 号

字数：120 千字

版次：2015 年 12 月第一次

印次：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印刷：遵义德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有关湄潭文萃的几句话

周开迅

湄潭文萃所选作品系湄潭本土人士或在湄潭客居的县外人士所著，内容应涉及湄潭历史上重要的人和事，以非虚构作品为主。我在第一辑湄潭文萃《苟中一诗全编》序言里说过，文萃是有门坎的，也就是有条件的，不单纯以成就论英雄，也不因为你昼夜不停地吟唱着故土，就可以选你的作品来出版。或者说，她是文艺的，又是文化的，还是文史的，三者兼有者，或者某一方面特别突出，并且已经过历史的检验，方可入选。

这次推出青年作家胡静的散文集《湄水弦歌》和青年诗人曹裕强的诗集《在湄潭与一片茶叶相遇》，都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都有着湄潭历史文化的底蕴。

胡静除了创作小说和散文作品外，一直致力地方文献的编纂工作，在接触诸多历史细节时有感而发，经年累月，遂有了质地深厚的《湄水弦歌》。记得大约三年前，我看了她发表在《贵州作家》等报刊，写浙江大学西迁人物的散文后，对她说，类似的题材若能成为一个系列，且能集成一本书稿，我就给列入湄潭文萃。如今《湄水弦歌》问世，又为解读浙江大学西迁文化和湄潭茶文化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文本。全国知名作家、市文联党组书记、原湄潭县委副书记肖勤特地给她写了很肯定和很鼓励的序。这对湄潭主流文化、特色文化的传播，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曹裕强多年来亦浸泡在本土文化的研究之中，是浙大西迁文化、茶文化和民俗文化方面的专家，参加了湄潭重要文化载体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创建工作，是湄潭不可多得的人文专家和文史作家。这次推出他的讴歌湄潭本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诗集《在湄潭与一片茶叶相遇》，一方面是对他的诗歌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他对地方文化所作出的贡献的一种褒奖，展示一个地方文化学者的本土人文情怀。这同样是接触湄潭文化的一个途径。

以湄潭文萃之二、之三的名义同时推出两个青年作家、诗人的作品，是一个特例。他们二人的作品与首辑湄潭文萃作者苟中一的文学成就自然无法比较，因为前辈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在传统诗词创作方面。但是，他们用现代的方式打通了湄潭历史的文脉，故亦有值得推出的理由。

我们期待着下一位从容不迫地出现。

以我心 还明月

肖 勤

胡静这个人，怎么说呢，名字和性格一样的好，安静、恬静。而文字和性格也一样的好，静谧、素静。气质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但修为是后天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胡静的好，绝对不是因为名字起得好。

胡静这个人，怎么说呢，她的听力有一点点欠缺，但在文学圈子里，没有任何人觉得要去特意为她做什么，她也从未有过压力 and 不安。这是胡静自身的淡然所至，所以大家在一起时都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当回事，也绝不心疼她。为什么要心疼？不就是听力差一点，一不妨碍安定团结，二不影响致富奔小康。而且你要是说她坏话，没准她还听得真真的——所有的玩笑，说到底还是因为她自己的好，这家伙个子小，但是大气。所以我也才敢在这里揭她的老底。

搞文学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怪习性，我的圈子里不乏有说着说着把康师傅盒子往人头顶上扣的人。对方呢，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把头上流下来的方便面“滋溜”吸进嘴里，然后说，你扣就扣，整那么多盐，想咸死我，再擦了脸起身和他打架。而胡静没有那些怪癖，实在说有，无非是她属于那种喜欢专心致志地做事情的人，这让她显得不合时宜，仿佛不太懂事，不知道怎么与心思复杂的人相处得更加圆润。

我倒觉得这是好事。

这些年胡静出了不少作品，散文、小说、诗歌，都挺好，都能玩，而且获了省级大奖。此次收录进集子的作品，跟她的情怀和历程有关。她近年来先后抽调到档案局、文管所、党史编辑部等单位，做的都是与史料收集整理相关的工作，特别是浙江大学西迁相关的人和事。

有一段时间，胡静与李芝惠、张宪忠、曹裕强他们一起，每天工作在宁静庄严的文庙里，从成堆的故旧中寻找浙大西迁的每一段宝贵时光，并拂去之上的尘埃。我曾经去过一次，那是初秋的早晨，下过雨，有点冷，这使得肃静的文庙多了一份清冽，一跨进高旧的门槛，小城的喧嚣顿时隔在了门外，让人有点惶然，不敢大声说话，也觉得寂寞，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石板间有蕨类植物在悄然生长。就在这静的、冷清的所在，他们一呆就是好几年。此间，胡静阅读了大量史料，并用心作了整理。

湄潭有两张呈现给世界的名片——浙大西迁地、湄潭茶。这两张名片都与中国的历史紧紧相系，浙大西迁在湄潭期间，科学和教学得到重延与生长，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卢鹤绂、李政道……中国五十二位两院院士，当年都在湄潭教学和求学，他们与新中国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在当年的烽烟战火中，是湄潭给了他们一隅教学与生存的净土。这不能不说是湄潭的荣幸，也是他们的幸运。再说湄潭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线被封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在湄潭设立茶科所，研制了“湄红”红茶，借道史迪威公路和驼峰航线去往东南亚各国，换回了抗战所需的枪支弹药。一片柔弱的茶叶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紧紧相系，如此，当年成就这段历史的人，必当被

后人所尊重且书传。

湄潭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一直在零碎地做着这些常人看来没有“搞头”的事情。这个小城之所以令人感动，也跟这些藏在民间，居江湖之远却自觉地寻找珍珠的人有关，胡静就是其中一个。或许，这些年如果她多花点心思做大文章，写小说，她会冲得更远，但数年来胡静一直在完成着这本书的书稿，现在它终于要出来了，整体亮相，我想它一定会成为一部湄潭档案历史的有益补充，也就是说，它会比一般的小说集出版更受关注，最好是能够成为湄潭的官方宣传资料或赠礼，如此，也算是她给生她养她的湄潭一个最珍贵的回报。

胡静这个人，怎么说呢，为序之时，她仍然以抽调身份工作在档案局里。抽调期间，她协助总编编撰完成了《湄潭县志》，《中国共产党湄潭县历史》等史志书籍，并独力总纂完成了110万字的《湄潭百科》。中国的体制是个让人纠结的东西，县志也好，档案工作也好，胡静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之一，但是因为身份的原因，胡静置身于教师与县志工作者之间，来去不得。我想，若是此书出版后，能有某君惦记注目，将之来去不得的尴尬化解，让她安好于文学或史海之间多好。如此，也算是她耗费数年光阴，做这些研究和寻找的最好回馈吧。

最后，还是希望胡静回到文学中去，这年头，才女不好寻，何况是安静不发疯的才女。

2015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上辑·浙大迁湄

- 竺可桢：羸肩担日月 /2
胡刚复：双修寺的燃灯佛 /21
费 玶：风萧萧兮湄水寒 /28
王淦昌：牧歌悠悠荡湄水 /35
苏步青：破庙里的菜根香 /41
束星北：人生长恨水长东 /49
钱宝琮：《骈枝集》里的湄水风光 /55
卢鹤绂：湄城巷陌 京腔悠扬 /61
谈家桢：蜚伏待飞 /68
舒 鸿：弄潮儿向湄江立 /77
丰子恺：巨椽绘湘水 /82
马一浮：此情不关风与月 /87
章 用：把黑板挂在胸前的流星 /91
李政道：求是一年桃李情 /94
严溥泉：民国县长的另类侧影 /101
袁慧泉：一九四五年的回忆 /108
松本米子：激荡湄水的东瀛情歌 /116
蒋佐梅：一枝寒梅独凌春 /121

陈绵祥：一腔幽情付诗行 /129

张侠魂与陈汲：《竺可桢日记》里的杏花疏影 /136

傅蔓云和邱蕴芳：星星的眼泪和微笑 /144

下辑·茶海拾贝

茶景篇

恒久的象山 /152

通向茶海的途程 /161

茶满客楼屯 /165

平灵台问茶 /169

金花，茶香的村庄 /174

茶人篇

张天福：盗“茶”的普罗米修斯 /178

刘淦芝：长相思 /183

李联标：茶行僧 /189

夏怀恩：夏之温柔 泽及茶绿 /194

何殿伦：一代茶农 /200

湄中那条巷陌（代后记） /204

上 辑

浙大迁湄

竺可桢：羸肩担日月

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将浙大迁到湄潭。

这是1940年，竺可桢在湄潭考察一天后，在日记中写下的。短短二十余平淡的文字，浓缩了浙大人在1937年11月11日——那个冬风凛冽的日子，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在浙大西迁路上饱受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终于在贵州的遵义、湄潭寻觅到一方办学佳地，得以继续开展科研和教学的欣慰之情。

这是浙大的命运，也是竺可桢的命运。他带着全校700多名师生和一切搬得动的图书仪器开始西迁时，心里就有个大方向：不去武汉、重庆这些内迁大学过于集中的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从来没有接触过大学生活，却有着良好学风传统的城镇、乡村，既可以减少生活开支，又可以躲避敌机的轰炸，还可以开启民智。于是，初徙建德，再徙江西吉安、泰和，三徙广西宜山，最后到达贵州遵义、湄潭。

1940年1月16日，竺可桢从贵阳抵达遵义，受到全城士绅的欢迎。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迁到遵义的浙大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同时派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到湄潭筹划迁校事宜。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10日正式开学上课。

9月22日，竺可桢偕胡刚复、费巩教授来湄的次日，考察了城北20公里永兴场的江西会馆、三楚会馆、四川会馆、南华宫等处后，将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理学院及师院理科速迁湄潭县城。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贵州黔北找到了一方适于教学科研的净土，并在这里扎根成长、开花、结出硕果。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被世人称为“文军长征”。

二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这是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刚刚接任浙大校长，与师生首次见面时发表的治校宣言。在这个著名的宣言中，他把教授人才的充实列为治校的首要，并付诸于实践中。无论是在校舍破败的浙大原址，还是炮火纷飞的西迁路上，他都没有忘记履行。来到遵义、湄潭后，他更是把教授们当作宝贝。物理学家束星北是有名的“大炮”，当面冲撞过蒋介石，屡次冲撞、并讥讽竺可桢是不会找钱的校长，竺可桢照样聘请他。束星北在学校里和人打架，竺可桢替他收拾烂摊子；牛津出身的教授费巩外号“驸马”，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婿、苏州大家子弟，当面冷嘲热讽竺可桢“只会看天，不会看人。”在费巩无党无派的情况下，竺可桢照样坚持请他出任训导长。1945年，费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在重庆失踪后，竺可桢还上下奔波，全力搜救。1958年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仍然坚持给周总理写信，清查

费巩的下落。那时全国大跃进，审讯工作也大跃进，听到从对监狱里的特务的审讯中，查出费巩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不久就被杀害，并用镪水毁尸灭迹的消息，已经皓首白发的竺可桢，怆然泪奔。

竺可桢爱护、关心、支持苏步青的故事，更是人尽皆知。在湄潭稳定下来之后，他明了苏步青对妻儿的牵挂之情，从吃紧的经费中抽出 2000 元给他当路费，让他把妻儿接过来。为让苏步青的日本妻子松本米子免受盘查，他还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来手谕。手谕只有短短的十个字，“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时逢抗日战争，中国的老百姓遭到日军残暴地蹂躏，枪杀、放火、强奸等暴行不时发生。中国人对日本人非常仇恨，如果一不小心，让人家知道了松本米子是日本人，很可能就被打死。竺可桢要来的特别通行证，使他们安全地抵达贵州湄潭。在湄潭安定下来后，浙大师生及败退老兵的涌入，致使小城物价飞涨。苏步青的工资维持八个孩子的生活难以为继。竺可桢从遵义到湄潭去视察时，见苏步青在晒白薯干，立即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部聘教授。校聘教授变成部聘教授，工资要从原来的 350 元变成 700 元。苏步青家里的日子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窘迫，他就让苏步青的两个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住校伙食就不用花钱。听说住校苏步青家里棉被不够，又特批他们住在家里，在学校免费吃饭，帮助他们安然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是以苏步青每次谈到竺可桢校长时，都情不自禁地说：“竺校长真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当宝贝啊！”

浙大的教授们，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张绍忠，束星北，张

荫麟、叶良辅……每一个人都是大师级人物，单是提到名字就让人肃然起敬。因为竺可桢，他们成群结队来到浙大，来到偏僻的小城湄潭任教。

所谓大师，都是特立独行，个性张扬的。任何人想要领导这样一支教师队伍都绝非易事。然而，教授们却个个对竺可桢尊敬、服帖。竺可桢让光谱学家朱正元兼任附中校长。历来不喜欢冗杂行政事务的他说，“竺校长命令我做的事，我从来没有违抗过。”史地系教西洋史的顾谷宜教授回到杭州后，竺可桢请他出任浙大训导长一职。他说：

“这是竺校长要我干的，我明知困难，也不能推辞。”就连性格暴躁的束星北对他也是敬爱有加。时至今日，在历史的书页里，湄潭文庙浙大图书馆门前的石阶还存留着这样一幅图画：一个雪花如飞絮漫天飞舞的冬天，天地全被染白，狂风吹打着门窗，人们不是在教室里上课，就是躲在温暖的屋子里烤火，少有人逗留于室外，湄潭文庙浙大图书馆积满白雪的石阶前，却有一个人在久久地徘徊。有下课的学生下课经过，看清是束星北老师，觉得奇怪，问他怎么一个人站在雪地里。他噓了一声说：“声音轻点，竺校长在这屋里，我有事要向他请教。”学生问他怎么不进去？他答说等里面的人出来再进去。短短两句对答，呈现了魁梧高大、性格暴躁的苏北大汉难得的细腻和柔情，听者莞尔之余，又不禁对竺可桢肃然起敬。

有了这样一支戮力同心的团队，浙大处艰危之中而不坠，在偏僻的山城崛起成为中外闻名的“东方剑桥”就不足为怪了。

1944年10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驻华科学考察团团团长李约瑟沿着黔北崎岖的山路，在湄潭作了为期六天的

考察，对湄潭这个小小的县城，有这么一间高水平的大学惊叹不已。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次年，他在英国《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再次回忆浙大时，情不自禁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遵义之东 75 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

一时之间，浙大名声响亮，学子们纷纷前来求学。那时，兵荒马乱，匪患丛生，加上贵州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常常无车可坐，有钱的学生还好，可以花钱请轿夫抬。没钱的，或者人高马大、身体笨重的，就只能靠双足步行，成群结伴也时常受到土匪的袭击。即使有幸搭上当时运货的“黄鱼汽车”，人也只能坐在高高的货物堆上。货物是布匹棉花还好，是水银就相当危险，贵州山路又多，翻车成为平常之事。水银沉重，拉水银的车压到身上必死无疑。即使是这样，学生们仍然甘冒险阻，间道来归。

多年以后，他们成为花发老人，忆及当年，还情不自禁唱起当年浙大教育学院《教育系之歌》：“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风晨雨夕聚一堂。敬业乐群兮灿然日彰，学不厌而教不倦兮，发吾先哲之辉光。他年，他年勿相忘。”

三

西迁使浙大在僻静的山区乡村，找到了相对安静的治学空间。学校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无论是天上敌机轰炸，还是地上的炮

火连天，他们安之若泰，争分夺秒、随时随地开展教学和研究。

穿越炮火，经历了风霜病疼折磨的浙大人来到遵义、湄潭后的日子仍然艰苦。教室在祠堂里，一块木板打几个桩，钉在地上就是凳子。吃饭是“蜻蜓点水”（蘸着盐汤下饭）、“逢六进一”（吃六口饭蘸一点霉豆腐）。灯是桐油灯，三根灯芯，一般只点一根，点多了桐油就不够用了。一夜下来，教授学生的鼻子都被熏得黑黑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写的《久别浙江大学诸讲友》诗中，那句“犬室能容师子坐，蚕丛刀遣五丁开”正是浙大西迁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竺可桢仍然以培养学生奋斗和牺牲的“求是”精神为己任，要求学生形成“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独立人格。

“求是”校训提出的时间是1938年11月19日。那时浙大正行至广西宜山，天上敌机轰炸，地上瘟疫肆虐，物资短缺，经费拮据，竺可桢也刚刚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恸：一年半前，夫人张侠魂和幼子竺衡染上痢疾双双过世。在这样的时刻，他仍然用瘦弱的身体发出了“求是”校训的金石之音。在那个巨敌当前、国命如缕的年代，年轻人远离家乡，身边没有亲人，经济又极为困难，竺可桢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用嘹亮与悠扬的音韵，打开了日月星辰，让他们从愁苦、茫然中振作起来，将全副身心倾注于学习和科研之中。竺可桢还强忍悲痛，捐献出了爱妻张侠魂生前的12件物品，用她生前积蓄设立“侠魂”纪念奖学金，以此资助女生中家境清寒而成绩优良者。成立会议上，为渲染气氛，主持人还借来哥伦比亚式留声机播放歌曲，加利·柯西演唱的《甜蜜的家庭》给会场带来了